

教育观念的历史意涵: 行动、意图与语境

——陈桂生《孔子授业研究》的方法论思想阐释

周兴国

摘要 陈桂生先生所著《孔子授业研究》以孔子授业为研究对象,把《论语》看作是有关孔子教育实践的记录,即通过语言来显现的教育实践(授业)。为把握孔子如何授业这一问题,《孔子授业研究》主要是从语境而不是从语义出发,来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孔子授业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开创性工作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对象上,《孔子授业研究》将孔子授业行为而不是孔子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取向上,“历史”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力图把孔子的授业行动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以回归我国教育文化的源头。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相互支撑。

关键词 陈桂生; 孔子; 授业研究; 方法论

作者简介 周兴国/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芜湖 241000)

《论语》是一部记录有关孔子对其弟子问题所给出的回答的语录体经典。时代的久远以及语义的嬗变,使得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孔子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如何准确地理解孔子乃至真正回到孔子思想的源头,便成为孔学中的一个理论问题。陈桂生先生所著《孔子授业研究》,以孔子授业为研究对象,不仅在理论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同时亦确立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取向,即历史语境中的孔子授业。在教育史研究中,对真实性的追求,即力图还原孔子教育思想的取向,既在《孔子授业研究》中再现,同时也通过将孔子的教育思想研究转向孔子授业的行为研究,并且把孔子的授业放在历史语境中来理解。原本着眼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历史的与逻辑的分析——则在长达十五年的努力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教育史研究方法论。

一、“孔子授业”行为作为对象的教育思想研究

与一般教育史把孔子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不同,陈桂生先生所著《孔子授业研究》则以孔子的授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我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不寻常的创新。说它极为不寻常,是因为在已有有关孔子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有关孔子的教育研究中,我们几乎不能见到专门研究孔子的授业行为;也正是因

为这一研究的独特取向,从而超出了一般教育史,特别是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常规,显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在通常的教育史研究中,有关孔子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语》及其相关文本的分析,来揭示孔子的教育思想。所谓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指孔子对于教育的主张与看法。长期以来,人们试图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提取孔子的教育思想。^①然而,当《论语》被看作是孔子及其弟子有关教育与学活动的记录时,这种颠覆常规的研究取向,便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涵。

《孔子授业研究》的立场是“不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孔子授业问题,把孔子授业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观察。”^[1]所关注的“不是他的‘教育思想’,而是他到底如何授业。”^[2]这一研究对象的设定,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新提出,而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的变革。通常,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流行教育史,侧重于通过对孔子言论所蕴含意义的阐释,而获得关于孔子对于教育的认识、观念、主张与立场;或者试图通过孔子的言论——《论语》及其显示出来的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论,以及通过对《论语》作为经典的文本分析,来阐明孔子的教育思想。但《孔子授业研究》的方法论的前提则是:通过孔子的教育实践(授业)来揭示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孔子授业行为而非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这正是《孔子授业研究》不同于一般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的独特之处。

授业作为一种行为,并不同于以语言来表达的思想。通过语言即通过思想家借以表达其思想的概念和命题来阐明某种思想或观念,是教育思想史研究最通行的方法。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要通过某个行为的分析来把握某个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难就难在,研究者首先要了解某个行为本身,例如在《孔子授业研究》中,就要了解孔子是如何授业的,然而,现有的文献资料对于这方面的信息透露是极其有限的。虽然如此,如果研究者把经典文本的内容看作是语言行动,即通过语言来行事的话,那么研究者也就从中能够获得极为重要的但在传统的研究中不会给予关注的信息,借助这类信息研究者就可以重构某些行为,从而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来获得对行动者思想观念的把握。当研究者试图把经典文本的语言看作是语言行为,而不仅仅是概念和陈述时,则其中所隐含的方法论思想便已然显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理解语言和理解语言行为,是需要采用两种不同的理解策略的。当研究者把言说看作是一种行为时,这样的立场就会促使研究者把《论语》的孔门师徒对话,不是当作经典的文本来分析,而是看作实实在在通过语言来显现的教育实践(授业)。这种立场意味着,研究者是从语言行动的角度来对待观念和概念。“在语言行动中,内容和表达之间没有严格的差别,但是风格、词汇和其他表述的维度是……内容的一部分。”^[3]而如果仅仅把经典文本看作是思想的语言表达,那么研究者就可能

^① 详见:周勇. 孔子与中国名师的专业传统[J]. 全球教育展望, 2012(11): 8-12. 刘良华. 论语的开篇与教师的成长[J]. 全球教育展望, 2012(11): 13-17.

只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并且把经典文本看作是孤立的对象。当经典文本被看作是语言行动,并且其意涵的理解不仅仅服从于文本的表达(概念或语词),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语词所使用的语境。

《孔子授业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开创性工作正在于,它把《论语》看作是有关孔子教育实践的记录,即通过语言来显现的教育实践(授业)。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对《论语》中微不足道信息的敏锐把握,对历史语境的了然于胸,以及浓厚的语言阐释力,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识基础。为此,陈桂生先生“历时十五载,经过四个阶段的摸索”,^[4]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干扰中以及在有关《论语》语境文本缺失的背景下,对孔子授业情况有了一个系统地把握。虽然作者给自己研究的定位是: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与综合,了解孔子授业实践;虽然作者曾自言“能了解多少是多少,不求全,不求系统化,也不求甚解”,^[5]但是《孔子授业研究》有关“君子之教”、“学与思”、“启发”、“因材施教”等研究,以及“外篇”所涉及到的《荀子》《孟子》《大学》《学记》等相关研究,不仅向人们提供了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系统而全新的认识,而且也向人们显示出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新的研究取向。

《孔子授业研究》的取向是“把《论语》中提供的同孔门师-弟子交往相关的信息,全面地加以分析。把相关信息归类。或从同类信息中作出概括,或把不同类的信息加以比较,用不同或相反的信息相互验证、校正;以平常心看待同孔子授业相关的信息,避免使孔子授业在古今授业文化对比与中西文化节对比中错位。”^[6]这种研究取向表达了历史观念阐释的思想意涵,即在历史观念的阐释中,努力做到“避免错位”。

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常使得历史研究出现“错位”问题。已有教育思想史研究的错位问题,主要有“中西错位”和“古今错位”两种表现。“中西错位”通常表现为以西方的观念和概念来诠释作为中国教育文化源头且完全不同于西方教育的孔子的教育思想。例如,以“课程”的概念来解释“礼”“乐”“射”“御”“书”“数”,以教材来解释《礼》《乐》《诗》《书》;“古今错位”主要表现为,以今人的认识和观念来诠释孔子的言论,如以“教育平等”来解释“有教无类”,如此等等。历史错位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对孔子教育思想解释的丰富与深入,我们离孔子的思想本源也就越来越远。历史研究的错位,在教育思想研究中如此普遍流行,以至于它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不受任何质疑的研究范式。

教育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错位问题,与研究者仅仅从语义的角度来分析经典文本密切相关,也与研究者的某种心态相联系。恰恰是从语义出发或基于历史文本的概念阐释,为满足研究者的某种心态提供了条件。当历史研究者试图把过往的教育思想看作是表达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工具时,教育思想史家就会对过往的教育思想作有利于他自己诠释的取舍,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时代之用者取之,不合时代之用者则舍之。这种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而要实现这样的研究取向,所用的策略便是以我们时代的话语体系来重新诠释过往的借以表达教育思想的概念(语义),对于过

往的教育思想进行话语系统的转换工作。对过去教育思想的理解就会演变成用自己的话将教育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梳理、排列与转述,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就演成为低水平的对过去教育思想的叙述。据说这种转换工作的价值,在于“古为今用”,在于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假设,即过往的教育思想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至于这种转换本身是否合乎思想自身的逻辑,是否合乎教育思想家的本意,是否合乎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法则,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转换工作,教育思想史家获得了解释过去教育思想合法性依据。不顾历史语境,只是就概念论概念,或者想当然地以为某位教育思想家所使用的概念,就理所当然地具有某种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含意。例如,杜威的“经验”或“生活”概念、赫尔巴特的“兴趣”概念、洛克的“德行”概念,等等。

基于语义的教育思想史研究,使得“望文生义”得以盛行,并使得对于过往教育经验乃至教育思想的理解陷入肤浅化。从语境出发而不仅仅从语义出发来理解经典文本,能够为避免历史研究错位问题提供方法论保证。实现从语境出发来理解孔子或《论语》的意图,是由作者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来做保证的。“每次读《论语》,最想知道的,是孔子到底如何授业。”^[7]从这个问题出发,《孔子授业研究》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目标:“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不在于提供什么看法,而在于撇开什么看法,即去除对原始资料的先入之见,排除阅读障碍。”^[8]

二、语境中的孔子授业意图

语境、授业及其意图,构成了《孔子授业研究》始终关注的焦点。对孔子授业行为的明确理解,取决于对孔子授业行为意图的理解。而要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却又必须要把孔子授业行为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理解。语境是说话人说话或提出某种观点的状态或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日常的交流中还是在严格的文本写作中,语境都是文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并且是作为文本的隐含部分而存在。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则对文本的理解,就变成对文本的望文生义。当授业成为一种与教化有关的行动时,要理解孔子的授业行为,就不能不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也就是孔子为何去授业以及孔子为何以那种特定的方式去授业。由此而引发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孔子言说的意图?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语境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还原孔子言说的语境?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一个语言行动之意图的理解,在历史文献资料非常有限的背景下,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对于理解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言,尤其困难。单纯依据文本并通过文本分析来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即孔子为何授业)的问题,容易因为语词所蕴含的语义上的变化而出现“以今度古”的问题。《论语》作为对话体文献,虽然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问与对,但语词意义的历史性语境是“孔子授业研究”绕不过去的障碍。

哈贝马斯指出,“言语者在一定的语境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具有基础意

义。”这种主张意味着，理解由经典文本而显现出来的概念与语词，是把这些概念与语词看作是一种言说行为。在此言说中，所谓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也就是努力去把握言说者的意图。“语言表达的意义与(a)语言表达的意图、(b)语言表达的内容、(c)其在言语行为中的使用方式之间存在三重关系。”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于语境，“参与的行为者都努力在共有的生活世界当中，根据共同的语境解释来一起确定其行为计划。”^[9]正是通过语境，言说者的意图乃至语言表达的内容才得以正确地理解。根据哈贝马斯，意义的理解，关键是对言说者意图的理解，而理解言说者的意图，就不能不考虑语境。这是有关意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表征《孔子授业研究》所隐含的方法论之说明。

范梅南关于词语意义的生活方式立场，对于说明语境在理解词语意义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范梅南指出，“曾经反映出生活意义、描绘了生动的世界的语言，现在已经变得残缺不全、毫无生气、空洞乏力，失去了昔日的表意功能。”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们那里，都会有其对该词语的自己的理解。这种对词语的不同理解，所反映的，是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范梅南对“关心”一词的理解。要注意的是，范梅南这里所阐释的，并不仅仅是“关心”词语的含义，更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关心所产生的体验。对“关心”一词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关心的本质以及过度关心所可能引发的问题。而当人们试图对“关心”一词进行新的意义建构时，这种赋予新的意义的尝试，则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重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方式和词的意义之间，存在着每个研究者都不能忽略的联系。所以范梅南说，“恢复或找回‘care’的本质真义并不仅仅是作简单的词源学分析或词语用法的解释，相反，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构……”^[10]词意义背后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对象。在许多时候，人们只是谈论词语的意义，而忽略了隐藏在这个意义背后的生活方式。语境，正是提供了类似生活方式的背景作用。凭借语境，我们才得以准确地理解经典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人们的相互理解，正是由语境来提供基础和前提。

虽然《孔子授业研究》并没有引证上述不同学术流派关于语词意义、语言意义及其与语境的关系的主张，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孔子授业研究》始终把对孔子授业行为的理解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进行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每个时代的人们，关于所处时代的记载，一般主要关注在当时人们看来值得记载的东西，无须记载当时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正是习以为常的情况，才是某种事情的基本的事实。这种基本事实，正是后人无从得知又难以体察的情况。”^[11]这里所谓“习以为常的情况”，借用剑桥学派的话语，那就是“惯例”，一种“默示的、被预设的语境”，是“流行于过去特定语境下的默示假设和实践”，而“对惯例的理解，无论多么隐含，仍然是理解所有类型言语行动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面临的双重困境，他要探索和说明过去的惯例……这样的惯例在历史资料中从不会被彻底无余地说明。”^[12]但是，原始资料和历史条件能够为理解这些惯例提供线索，从而为克服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奠定基础。

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双重困难,《孔子授业研究》则是通过双重努力来克服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的。这双重努力分别体现于《孔子授业研究》的“内篇”与“外篇”。“内篇”主要是基于《论语》而作的意图分析。但这种意图分析不同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分析,而是通过将文本整体局部化,然后通过建立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梳理出孔子授业的意图所在。麻烦之处在于,教育史研究者如果不作出巨大的努力,就不能够恢复若干年代前某个人物授业行为的语境(情境)的。《论语》文本的简略以及语体记载的局限,使得仅仅从《论语》文本来探寻孔子授业的语境,又显得极为不够。为此,《孔子授业研究》又借助“外篇”将对语境的考察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通过对先秦儒家诸如荀子、孟子所传文本的考察,通过对《大学》《学记》等经典文本的考察来实现对语境的还原。唯有在语境的基础上,特定的经典文本的观念才能够得以理解。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因而语境构成了文本的隐含的部分。《荀子》《孟子》《大学》《学记》虽然与孔子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但作为一脉相传的思想体系,都共享一个较大的传统,因而这个较大的传统能够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理解文本的背景条件。同时,《荀子》《孟子》《大学》《学记》又处在一个连续的传统之中。这个连续的传统尽管会因为突发的历史事件而发生断裂,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传统,但至少在这个传统的连续体内,语境是共有的。

上述双重努力所获得的结果是,孔子授业意在“君子之教”,属于“德行之教”,“这种德行之教,又有别于一般的伦理之教,而属于以礼乐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伦理之教”,^[13]以“弟子修身为本,行为指导为辅”^[14]同时它又是诗、书、礼、乐之教,为用而学,因学而教。概言之,孔子授业既“教弟子学”,又“长善救失”。对语境和文本的双重分析,孔子授业的真实意图才真正显露出来。可以这样说,《孔子授业研究》的“内篇”立足于孔子授业的具体语境分析,而“外篇”根据《荀子》《孟子》《大学》《学记》有关记述和论述,则对孔子授业的总体背景语境,作出了与“内篇”可相互参照的语境分析。“内篇”是基于《论语》而作出的语境分析,而“外篇”则是对孔子授业意图理解所作的历史条件分析。语境和文本的双重分析,或原始资料与历史条件的的阐释,使得孔子的授业意图——“君子之教”、“德行之教”、“教弟子学”等,既满足了观念史研究所必须真实性要求,同时也实现了当下学术著作的创新性要求。

《孔子授业研究》关于“有教无类”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图与语境双重分析的极好范例。作者指出,“关于‘有教无类’以至孔子有关‘教’‘诲’的其他言行,常有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以今度古,忽视孔子时代‘教’与‘诲’情境同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教育’情境的区别。”^[15]这种立场实际上与斯金纳的取向不谋而合。斯金纳指出,“我们可能‘发现’某位著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16]这就是说,对于经典文本中的语词或概念的理解,必须要从语境出发,而不是孤立地从语言的意义出发。语境的不同,实际上所表达的,是教育方式的不同。“教”的意涵的差异,所显示的,恰恰是教育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当人们试图以现今的教

育生活方式来理解孔子所处时代以及孔子的教育生活方式,那么“以今度古”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

三、《孔子授业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关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方法之关联的理论。当研究的对象在本体和性质上发生转换时,则这种转换必定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要求。从本质上讲,研究的方法是用来理解和把握对象世界的工具。对研究对象的不同预设,则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变革。因此,从研究方法论出发,则对对象的重新设定或解释,往往预示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当孔子的授业行为,特别是孔子授业的语言行为,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时,则对此对象的理解,就必定要求实现方法论上的转换。通过授业行动来理解孔子,进而把握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史的独特范式,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孔子授业研究》将孔子授业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把孔子的授业行动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努力去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迄今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在努力尝试回到孔子那里,对孔子的言论进行解读,以期获得对孔子的时代认识。然而,明确提出回到中国教育文化的源头,努力澄清孔子授业之事实,却是此前所有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文献所不曾提出过的问题。授业作为孔子的行动,比不得通过孔子言论而呈现出来的孔子之授业(教育)的思想。同时,对于一项行动的探讨,亦有多种可能性。例如,由具体行动方式而折射出来的行动意识、这种行动意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可理解性以及这种行动意识对于后代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人类教育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如此等等。这是一个有关教育思想或教育观念史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即把研究的视角从孔子的教育思想投向孔子的教育行为(实践),并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时的教育生活方式、文本的语义与语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揭示孔子教育思想的本有之义。

二是在研究取向上,“历史的”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的有机地结合,为实现回归我国教育文化源头奠定了基础。《孔子授业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研究对经典文本的意义阐释,也不同于在哲学抽象层面展开的教育观念史研究。一直以来,西方思想史研究就有美国的“历史观念史”学派(以美国学者阿瑟·洛维乔伊为代表)和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之分歧。前者把思想史的研究聚集于“观念的单元”,关注经典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并把经典著作作为思想研究的惟一材料;后者则把注意力从关注经典文本转向语境,“要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那些观念和信念”。^[17]斯金纳指出,“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18]这种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被斯金纳称之为“历史的”方法,以有别于洛维乔伊所倡导的“哲学的”方法。概言之,前者

的观念史研究强调语义,而后者的观念史研究则更加突出语境。与上述两种思想史研究取向不同,《孔子授业研究》以历史的哲学的分析为研究取向。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孔子的授业研究》著作中,既以经典著作《论语》为分析材料,同时又将这种分析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力图使文本在历史的语境中有其本有之义,同时也努力使通过本文来寻绎孔子授业行动的语境,从而还原孔子的授业行动。

三是研究方法上,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相互支撑。与上述“历史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相呼应的,则在研究方法上的语境分析与文本分析的同时展开。在《孔子授业研究》中,经典文本分析仍然是重要的分析工具。而对孔子授业意图的理解,又总是把文本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放在语境分析中,通过对语境的分析来实现对经典文本的准确理解。对孔子授业研究的双重分析,既不同于传统的教育思想史研究对文本分析的专注,同时也不同于“剑桥学派”侧重于将思想和观念置于语境之中,从而实现了把经典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语义、语境和语用的有机结合。思想是在行动中呈现出来的。然而,行动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体的有意向的活动,它同时还包括在特定的环境下与特定的对象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言行为。当经典文本被视为一种语言行为的结果时,那么对孔子授业行为的理解,就变成对特定时代的孔子的本有思想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2][4][5][6][7][8][11][13][14][15] 陈桂生. 孔子授业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230 228 227 229 231 233 229 228 236 241 ,17.
- [3][12][17] 凯瑞·帕罗内. 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M]. 李宏图,胡传胜,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6 40-41 A.
- [9] 于尔根·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M]. 曹卫东,付德根,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59 65.
- [10] 马克斯·范梅南. 生活体验研究[M]. 宋广文,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74.
- [16] 昆廷·斯金纳.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A].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什么是思想史[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8] 昆廷·斯金纳. 政治的视界(3卷本)·总序[M].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2:8. 转引自:凯瑞·帕罗内. 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M]. 李宏图,胡传胜,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

: (9'#"@ G#))#'/ '(#) #* !%2/6#6(&/- J2%/9: =&'(#) ,
J)'%)'(#) /)2 G#E%4': J)'%"5"%'/ '(#) #) G, %) R7(9, %)6V9
Confucius Teaching Research S%' , #2#-#6@ . , #76, '9

ZHOU Xingguo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9'"/&': Mr. Chen Guisheng's book "Confucius Teaching Research" takes Confucius teaching as research subject , and view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record of his teaching practice , i. e. education practice (teaching) reveals by words. In order to grasp the question how Confucius taught , the book mainly starts from context rather than semantics to understand Confucius' teaching intention. The creative work of "Confucius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mainly falls on: research subject is Confucius teaching actions instead of pedagogical ideas; research orientation combines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rganically and makes efforts to get Confucius teaching intention from his teaching actions in context , backing to China's pedagogical cultural origin; research methodology are mutually supported by text analysis and context analysis.
?%@ 8#"29: Chen Guisheng; Confucius; teaching research

(责任校对: 王萍萍)